

新史学 &
多元对话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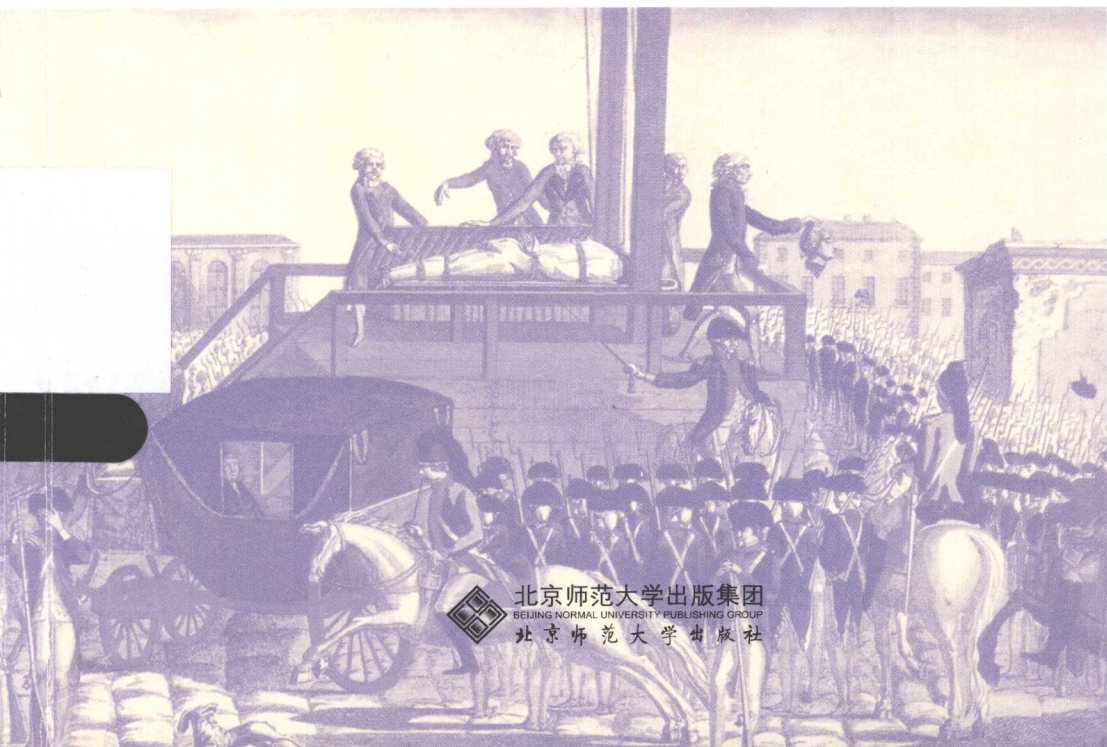
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补版）

高毅 著

法国的旧制度，像所有国家的旧制度一样，本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法国人，由于他们是法国人，就偏偏用了一种最可怕的方式，亦即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干掉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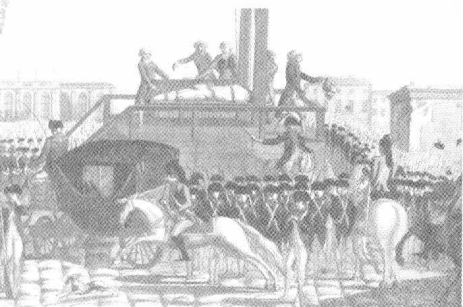
伊格内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36708

K565.41
25



高毅 著

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补版）



北航

C164488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K565.41
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补版)/高毅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5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ISBN 978-7-303-15856-0

I. ①法… II. ①高… III. ①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080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FALANXI FENGGE: DA GEMING DE ZHENGZHI
WENHUA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 mm × 230 mm
印 张: 20.7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陶虹 赵雯婧
美术编辑: 谭徐锋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北航

C1644881

序

十年浩劫把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十年改革开放给历史科学带来了新生。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从1977年起我得以重操旧业，讲授西方史学史，评介西方史学流派，招收研究生；同时邀请外国知名历史学家来校讲学，选拔优秀中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

本书作者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考入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的高材生。他于1977—1981年读完本科，1981—1984年作为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是对丹东的研究，接着又在我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正如高毅在《后记》中所述，他有幸在选择论文题目时，先后受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米歇尔·伏维尔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史教授林·亨特女士讲课的启发。这两位学者代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学派，前者从社会史转向心态史的研究，后者着重民族政治文化的考察。从1985年到1987年，高毅有机会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又受到该校历史学教授、原籍波兰的布罗尼斯洛·巴茨柯的影响。回国后他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在答辩中博得专家们的好评。

两年前，高毅曾考虑要把这篇博士论文修改出版。最近他把书稿拿给我看，要求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惊异地发现，这是一部崭新的著作，远远超出了论文原来的范围，面目焕然一新，在论点和论据上更加充实和成熟，更有说服力，堪称为近年来外国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可喜可贺！

我国历史学界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认识到必须运用新方法，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能进

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一时出现“方法论”热，各国各派的史学方法先后被引进，不少都冠以“新”字——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遗憾的是，介绍多，评论少；宣扬多，应用少；即使有个别人尝试用某种“新方法”来重新说明历史，也往往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失败的多，成功的少。除了难度大之外，其中还带有几分政治风险，使尝试者望而却步。

高毅此书也是一种大胆尝试，在我看来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它的主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被成百上千位中外历史学家重复阐述过的老题目，特别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法国和世界各地又出版了数百种新著。一个中国历史工作者，怎样才能用自己的观点分析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而不落窠臼？不仅做到不落窠臼，而且开辟研究和思考的新径呢？

我们过去在法国革命史学中，常常满足于说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群众的先锋推动作用，革命领导者的更替和革命的阶段性，雅各宾专政的必要性、彻底性、局限性及其失败的必然性，等等。这些论述都是对的，但是总感到有所不足，或者说有点一般化、简单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没有抓住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即法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第二，没有分层次地对各种革命现象与行为进行剖析，区别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并揭示它们的分合规律；第三，没有把影响革命进展的各种因素，特别是那些中介因素，全都挖掘出来，从而更细致、具体地说明革命成败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高毅此书之所以成功，可能正是由于他注意到我们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而努力加以改进。他善于借鉴国外史学方法与成果，把年鉴史学、心态史学、政治文化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引进历史研究，从而强化了我们的阐释武器，加深了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年鉴史学引导我们注意在历史长河中起长期作用的那些结构因素；心态史学着重考察群众意识与无意识的作用；政治文化史学强调民族的政治传统、习惯、观念、行为、象征物对群众特别是革命运动的影响。读者在此书中自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史学流派方法的反映和痕迹。

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更没有片刻放弃自

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他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始终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必然历史进程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他赞同林·亨特教授的许多看法，但不同意她孤立地对待法国的民族政治文化，把它同社会经济基础割裂开来的倾向。他在分析法国革命的激烈性和彻底性时，牢牢抓住革命资产阶级与群众结成联盟这条主线，同时强调以精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亚文化与革命群众亚文化之间的区别与对立。

但是作者也反对把一切历史现象都同经济生活直接挂钩，也不拟用阶级划分来说明全部政治行为，因为他认识到在历史表象和“终极原因”之间存在着无数“中介因素”，同时在驱使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无数动力中，不仅有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还有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思想、感情、心理因素。例如，法国革命为什么比早在150年前爆发的英国革命更激烈、更彻底？除了社会、经济、思想条件更成熟这一根本原因外，法国革命者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传统彻底决裂”的信念。这种决裂感一度支配着革命群众去砸烂旧制度的一切。随着革命的开展，国内外反动势力总是处处企图抵抗和反扑，于是社会上滋生一种无与伦比的紧张气氛，人们终日在这种气氛中生活，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危机意识，把敌对势力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阴谋”，因而产生一种“阴谋忧患”，群众轻信任何谣言。这样，决裂感、危机意识、阴谋忧患与谣言轻信症结合在一起，推动着法国革命群众一步一步地向最激烈的方向前进。这样的分析岂不比一般地谈论“革命的上升阶段”更生动、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吗？

与此同时，法国革命也需要正面的象征物来鼓舞自己：三色徽、小红帽、自由树、玛丽安娜、赫居利斯等都有其特殊功能。人们以更换人名、地名来表示对革命的支持，连语言、日历和服装也革命化了。为了法国的再生，需要培养与旧社会迥异的“新人”——对革命者的崇拜代替了旧的偶像崇拜。“联盟节”成为象征革命群众团结的最盛大的节日。这些都是我国史学界忽略的重要侧面，高毅则在本书中加以充分阐述。

为了建立新的政体，在革命者中间展开了一系列政治辩论，涉及重权轻法与重法轻权之争，公意高于王权与王权高于公意之争，一院制与两院制之争，强制委托制与代议制之争，代议制与直接民主制之争，等

等。但是争来争去，一直到拿破仑三世 1870 年在色当投降，才最后摆脱君主制，这只能说明法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彻底决裂信念的不现实性。如果仅用法国小农经济的普遍性来直接解释这种政治保守现象，不顾政治文化的作用，恐怕是又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诸如此类的革命政治文化的特点还有不少。例如，雅各宾专政强调政治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反党派性（显然不是不要党派，而是不要别人的党派），并且以此为借口来消灭政敌。细读此书，自会发现更多真知灼见。我顺便提醒初学者，这不是一本易读的书，决非浏览一下就能抓住要点；而一旦进入“角色”，你会获得双倍的收益。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指出：法国革命留下了丰富的政治文化传统，并创造了一种“内战式的政治风格”，它在革命后近百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文化的某种表现对我们而言也并不陌生。高毅的劳动果实不仅有益于世界史工作者，也有助于中国史研究的另辟蹊径。祝愿高毅在历史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张芝联

1991 年 4 月于北大朗润园

引言

在近代史上的世界民族之林中，法兰西民族素以“政治民族”著称。马克思说法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人们也常说：两个法国人到一起必谈政治。暂且不论这种说法在今天是否还能成立，至少在近代史上这的确是个事实。

一个民族如此普遍地热衷于政治问题，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个民族的政治事务一定有什么特别令人关注的特点。而政治事务过于引人注目，一般说来都是政治领域的情况不太妙所致。在一个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的社会，人们是不大容易看到这种对政治的普遍兴趣的；只有在那种党派纷争激烈，政治形势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社会，政治领域才有可能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众所周知，近代的法国正是后一类社会的典型。从1789年到1870年，短短的八十一年中，法国竟爆发了四次革命，经历过君主专制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专政制、帝国制的频繁更迭。起义，恐怖活动，革命与反动，内战与卫国战争，把近代法国搅得天翻地覆、满目疮痍，这种动荡频仍、危机四伏的客观政治环境，无疑是法兰西民族政治癖好的重要的外在因素。

其二，一个民族对政治的特殊癖好，还反映了这个民族本身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个民族的成员不是那种只关心生活中的非政治性事务、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毫无意识的狭隘观念者，也不是那种消极被动地接受政府行动影响的顺从者，而是那种把国家政治事务看作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并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去对其施加影响的参与者。法兰西民族正是这样一种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性、积极性的民族。

然而问题还可以进一步问下去：为什么近代法国的政局会如此动荡

不稳？为什么法兰西民族有如此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地要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法国的历史传统。因为，法兰西民族不仅是一个关心政治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注重传统的民族。一部史海勾沉的史学论著，一部在一般非史学研究者看来枯燥乏味的历史读物，在法国往往能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能像小说一样使大众着迷——法文的“历史”（histoire）本来就和“故事”是一个词。法国的34433个村镇几乎个个都有自己的地方史学会。写历史，也常常是人们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政治家，如梯也尔、基佐、路易·勃朗、饶勒斯、巴尔都、戴高乐等，同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出席巴黎社交界盛大晚宴的客人们，往往会因他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的某次内讧中相互厮杀过而吹胡子瞪眼睛地大吵一番，结果不欢而散。这种非同寻常的历史兴趣，说明传统在法兰西民族的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意义。就拿法国人那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来说吧，这里显然生动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尤其是与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就在这场大革命中，法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民众动员，以往被完全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的人民大众突然涌上了政治舞台，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政治阶级”，成为革命政治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甚至一度成为大革命的主导力量。这样一次参政经验，虽然时间并不很长，但在法兰西民族的心态上留下的痕迹却是极其深刻的：它使法国人民习惯地感到，既然他们在大革命中牺牲最多、贡献最大，因此只有他们，才应该是法国政治的主人。

不仅法兰西民族的政治参与意识有着这样的历史传统渊源，而且近代法国长期动荡的政治局面，也可以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找到它的心态根源。我们知道，1789年的法国革命人士是世界近代史上最豪迈的一群革命者。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令人咋舌的：同旧传统实行彻底决裂，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崭新的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看来，这种“决裂”不仅是彻底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一切属于传统的旧事物，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统统都应该受到无情的批判和否定。正像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法国人要在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要一劳永逸地

彻底改变法兰西民族的面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民族性格中一个鲜明的内在矛盾：既崇尚理性，又热情奔放、富于幻想，常常容易沉迷于不切实际的空想，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不言而喻，像法国革命人士要实行的这样一种同旧传统的彻底决裂和整个民族的全面更新，无疑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一点，革命派们实际上很快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可问题在于法国人往往就是喜欢做不可能的事。于是，他们便无可奈何地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紧张、烦恼和焦躁的精神状态之中，一种难以名状的忧虑感、焦灼感无时不在困扰和折磨着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国内外敌对分子的拼死抵抗、革命阵营内部层出不穷的分化与叛变，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布满了荆棘和陷阱，使他们感到处处危机四伏，步步险象环生。正是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政治危机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各种“阴谋”的神经质的敏感、警觉和恐惧），促使法国革命人士使出浑身解数，用超常的意志力量和无与伦比的首创精神，调动起由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组成的同盟军，诉诸起义、断头台、最高限价和专政等极端的手段，推动革命一步一步地激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种异常过激的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免不了会深深地刻有革命派的那种政治危机意识的痕迹，从而呈现出浓郁的分裂性、激进性和二元对抗性的色彩。政治文化传统就其本性来说是注定要对未来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影响的，大革命后法兰西政治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表现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尖锐对抗形态，也就这样被规定下来了。

本书的主旨即在于通过论述和剖析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状况，来揭示近代法国政治动荡和法兰西民族政治参与意识的文化心态根源，并从中对法兰西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进行一番透视。

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做好这个课题，对于深化法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对于探寻革命运动、政治动乱的一般规律和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不无裨益。

这里呈出的只是一个粗陋的初步尝试，它需要批评，期待着批评。笔者不才，斗胆抛砖，意在引玉也。

目 录

绪论：关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	1
一、“政治文化”与历史学	1
二、心态史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	3
三、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误区	10
四、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况	17

第一编 决裂——在传统中挣扎

第一章 宪法的窘迫	29
一、法兰西宪法观念溯源	29
二、法国宪制动荡的心态根源	34
三、否决权和一院制背后的隐忧	37
四、“无宪法，毋宁死”！?	42
第二章 代议制的困境	44
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	44
二、摆脱强制委托权的企图	47
三、树而不立的代议制权威	53
四、直接民主制思潮的干扰	57
五、“代议民主制”的尝试	61
六、无法摆脱的专制幽灵	67

第三章 平等的幻梦	71
一、空前的热望	71
二、荒谬的公民划分	77
三、女公民的悲哀	85

第二编 “祖国在危急中”

第四章 吉凶未卜的革命	97
一、“革命”——可咒的动乱	98
二、“革命”——理性的进步	103
三、“革命”——社会的危机	108
四、“革命”——矛盾的综合	112
第五章 为民族“再生”而战	118
一、“再生”没有榜样	119
二、“再生”任重道远	123
三、“再生”需要教化	128
第六章 革命的宗教礼仪化	139
一、破除旧象征的“宗教革命”	139
二、革命象征物的人民性特质	145
三、革命节日中的狂欢文化	152
四、日常生活的革命化	156
第七章 谣言的泛滥	164
一、谣言的起源	165
二、谣言与危机意识	172
三、谣言的功能	178

第八章 革命政治的公开性	187
一、公开性——法国革命的铁律	188
二、公开性与危机意识	193
三、反党派政治与专制独裁	200
四、导致雅各宾派衰亡的心态因素	207
结语：群众现象与法兰西内战式政治风格的形成	217
一、群众现象的基本特征	218
二、大革命时代的精英与群众	224
三、非理性因素与内战式政治风格	232
参考书目	238
附录一 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	249
附录二 法国式革命暴力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	273
后 记	312
增补版跋	316

绪论：关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

群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正表示着另外一种重要的辩证法，从而成为当前研究的主题之一。

——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

一、“政治文化”与历史学

“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出现较晚，正在走红，而且正日益把自己的影响辐射到政治学以外的其他社科领域。

这个概念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学概念，它的出现还只是三十多年前的事。195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发表了一篇题为“比较政治体系”的论文，首次运用“政治文化”一词来对各国“政治行为倾向性”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抽象的概括，由此开创了西方当代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潮流。

政治文化无非是受社会总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正因为如此，这个概念同“文化”概念本身一样，有着突出的模糊性特征，很难给它下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过，尽管有各种分歧，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阿尔蒙德在1966年提出的下述定义，看来还是最成熟、最有权威性的：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

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①

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的看法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白鲁恂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即国家）中客观存在的一套系统的政治主观因素，它反映一个社会的传统和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爱憎、大众的政治情感、领袖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规范；它使个人的政治行为按一定的方式运行，使政治体系具有价值取向，保证政治体系的某种一致性。他还指出，政治文化的概念试图更系统地解释一些固定的概念，如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人的基本价值观、公共舆论和民族性格等。

另一位学者卡瓦纳夫在他的《政治文化》（1972年）一书里系统介绍了各种政治文化定义，然后作了这样一个精辟的概括，令人耳目一新：

按照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政治文化看作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氛围和态度氛围的一种简略表达。按阿尔蒙德的观点，它是“特定的取向型式”，其中植根着一切政治体系，用塔尔考特·帕森斯的说法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即我们关注的是对于各种政治目标的各种取向。这些取向是政治行动的前提，它们是由诸如传统、历史记忆、动机、规范、感情和符号之类种种因素所决定的。^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政治文化概念具有这样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重视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

这种政治文化概念，显然同西方当代历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法国年鉴—新史学派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首先，研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了解该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政治的“态

①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② D. 卡瓦纳夫：《政治文化》，麦克米伦，1972年，第10～11页。

度型式”，这一点就是同法国年鉴—新史学派对“长时段”研究的关注相一致的。人们知道，年鉴—新史学派认为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在于变化缓慢但在长时段起作用的事物，如社会的经济体系、社会习惯、文化心态、生活方式等，相对于这些事物来说，短时段的人物活动、政权更迭等历史事件，只能算海浪表层上的泡沫，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东西，对总的历史进程并无任何实际的影响力，充其量只能起“吹皱一池春水”的作用，而且其本身的规模与趋势都是必然地受前者制约的，因此只有深入了解了长时段的背景，才有可能对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各种事件（基本上都是政治事件）作出符合本质的解释。其次，“政治文化”的概念特别关注于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年鉴—新史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正是力反传统史学把“日常生活”排斥于历史之外的做法，着重把历史探询的目光投射到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试图通过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芜杂朦胧的精神状态来寻求历史动力的源泉。再次，“政治文化”特别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这与新史学派愈来愈重视心态现象这一趋势也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研究某种“政治文化”的形成，正是心态史学政治方面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政治文化”概念显示了一种无可取代的史学价值，日益为当今的心态史学界所重视。

二、心态史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

“心态史”这个新潮史学概念，在我国也许还不太为人们所熟知，可在今日西方史学界真可谓时髦至极。所谓“心态史”，不是别的，正是作为传统史学对立物而出现的社会史学（亦即年鉴—新史学派的史学）在新近所获得的一个别号。其所以如此，在法国著名大革命史专家、马克思主义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看来，是因为近来“有一种最直接推动新社会史向长时段研究转变的趋势，这就是日益明显地向心态史发展的研究趋势”。他还认为，心态史并非社会史的对立物，而至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在这里一概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从年鉴学派的发展史来看，这个史学流派尽管从一开

始就在研究历史上各种心态现象，但他们最初的重点并非心态史而是经济史，只是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才通过经济史的一个变形——人口史的研究开始对心态史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终于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把重点完全转移到了这个方面，并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如今心态史学已超越了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系统，赢得了广大的群众读者，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竟成了“新史学”的同义词或象征。

那么，“心态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史学呢？伏维尔曾给过我们这样一个大致的定义：

心态史学乃是一种“第三层次”的史学，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次的史学。人们在研究了经济或社会结构的层次之后才能达到这一层次。这是一种极其引人入胜的史学，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史学，一切机械的或简单化的归约都受到了它的挑战。它已经涉及了一些明晰的思想层次，如精英人物和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及文化传播，它现在正愈来愈转向集体的无意识。

伏维尔这里说的“第三层次”史学，是法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个流行概念。在日益重视长时段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们看来，一般的史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传统的事件史，属于短时段史学；第二层次是经济的或社会的历史，即在一种“缓慢时间”的“半静止状态”中变动的“缓慢的历史层次”，属于中、长时段史学；第二层次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便进入了“长时段的囚牢”——心态史，它所揭示的是更彻底的长时段历史，这种历史具有“稳态”和“抗拒变化”的特征，因而愈益被人们视作对历史作长时段研究的最首要的领域。这种第三层次的史学所涉及的不再是任何易于变动的明确的思想或文化，而是一种潜在而朦胧的社会文化层，那里充斥着各种未曾道明的意识或观念，各种暗中支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习惯趋向，简而言之，它研究的是人们的态度、行为举止和所谓“集体无意识”。

伏维尔之所以重视心态或精神形态的研究，是与他关于意识形态与精神形态的差异性的明确认识分不开的。伏维尔认为，在人类的行为中